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金國記事 ——以金人死亡時間為線索的觀察

陳 昭 揚\*

### 摘 要

本文整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金人死亡時間紀錄，說明其敘述樣貌，並與南宋、金代的文獻比較之間的差異，討論差異的產生原因。其中，《要錄》的記載對象多為政壇要員，這應是李心傳有意留存金朝重要政治消息的結果。《要錄》的描述形態相當多元，顯示了《要錄》對於個別事件的不同掌握程度。對照現存南宋史書，《要錄》留有最多的金人死亡時間記載，符合《金史》之處也最多，紀錄的數量與品質乃是眾書之首。進一步分析，由於能夠博採前人說法，取捨所得也為稍後南宋史書的根據，於是《要錄》在南宋史書的金事流傳歷程中具有樞紐地位。然而《要錄》雖然多有正確記事，但亦不乏模糊、錯誤、遺漏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癥結應與李心傳所能參考與引用的資料有限，以及參引資料不易提供李心傳書寫所需的精確記載有關。最終，從參引資料對於《要錄》的影響所見，《要錄》紀錄金人死亡時間的挑戰，除了源於宋人得知金事的過程的曲折，也和其消息來源與金朝政壇之間的隔閡有關。

**關鍵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南宋史書、金朝紀錄、死亡時間、文獻流傳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The Records about the Jin Dynasty in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An Observation by Using the Death Times of the Jin People as a Clue**

Chen, Chao-yang\*

###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the death times of the people of the Jin dynasty in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the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Important Events since 112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Yaolu*”) were sorted in the study. The descriptions of these people were explain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Jin Dynast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were also discussed. Most of the records in *Yaolu* relates to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political world of the Jin Dynasty, due perhaps to Li Xinchuan’s motive to record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Jin Dynasty. There are various narrative styles in *Yaolu*, which shows that its author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incidents. Compared with the history book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aolu* has the most records about the death times of the Jin people, and it contains the most articles corresponding to *Jinshi*. Therefore, *Yaolu* has the most articles with the top quality among all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tory books. Based on further analysis, *Yaolu*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ncidents of the Jin Dynasty among the history book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became the basis of later history book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its author was able to widely adopt the descriptions made by former scholars and select the ones which were closer to the facts. Although many articles are correct in *Yaolu*,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obscure passages, errors, and omissions.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limited literature that Li Xinchuan could refer to, and the literature referred to by Li Xinchuan could not help him to write precise articles.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references on *Yaolu*, the challenge for *Yaolu* to correctly record the death times of the Jin people was caused by the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the incident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f the Jin peop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barriers between the sources of *Yaolu* and the political field of the Jin dynasty.

**Keywords:** 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 history book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cords of the Jin dynasty, time of death, transmission of literature

## 壹、前言

南宋文獻富含金代史實的情形乃為學界周知，所記內容也被金史研究大量運用。<sup>1</sup>相對於金方紀錄，即金朝本身所留下的資料，宋方紀錄常有特殊記載，或對相同的事實有著不同的描述，或是留有金方紀錄未見的說明，這些特殊的記載使得宋方紀錄在金史研究中具有高度價值。但在據以論說金史之前，前輩已有提醒，需要留意宋方紀錄的不足。早在清代，施國祁（生卒年不詳）便已指出：「大抵宋人承紀遼餘習，其說金事之謬有三，一曰傳聞，一曰附會，一曰毀謗，皆不甚足評。」<sup>2</sup>其中，紀錄的動機或立場，以及金事消息的流傳過程，皆會影響宋方紀錄的內容，記載錯誤或敘述模糊等現象原是常見。

討論真偽虛實之前，首先能夠看到的其實是各方紀錄的多元樣貌，各方紀錄各有記載重點，同件事情也常有不同的敘述內容。這種多元樣貌不僅出現在金宋兩方紀錄之間，也出現在金方與宋方內部的紀錄中。相較於數量較少的金方紀錄，豐富的宋方紀錄又有更多的記載出入。宋方紀錄說法紛紜的狀況，自是源於紀錄者的大量與著述性質的多樣，這既是得利於宋方文獻今日可見者較多，也應與宋人在當時原有更多的著述有關。此外，宋人能有更多說法的原因，多少也是宋方紀錄在金事傳述的過程中處於消息傳播的末端，傳播歷程帶來的影響更複雜，最終的成果便更多元。

基本上，今日已知宋方紀錄面貌多元，真偽虛實皆有，然而無論是全面通說，抑或針對特定議題而發，目前仍無具體評估這些紀錄內容的差異情形的研究。本文欲以時間紀錄出發，以金人的死亡時間為觀察對象，嘗試評估金宋兩方與宋方紀錄內部的敘述落差程度，先掌握其整體樣貌，再探求這些落差所呈現的問題。以金人的死亡時間作為觀察對象的原因約有幾點。首先，時間原是一種較

<sup>1</sup> 相關研究甚多，略為舉隅，如金朝的開國時間便有許多討論。見劉浦江，〈關於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1-22；李秀蓮，〈阿骨打稱都勃極烈與金朝開國史之真偽研究〉，《史學月刊》，2008年第6期（2008），頁43-49；董四禮，〈也談金初建國及國號年號〉，《史學集刊》，2008年第6期（2008），頁94-98、117；葉帥，〈關於金朝開國史相關材料的再思考與新認識〉，《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2018），頁168-173；程尼娜，〈《金史》「纂改開國史」辨〉，《史學集刊》，2002年第1期（2002），頁4-19。

<sup>2</sup> （清）施國祁，《史論五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7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據湖州叢書本影印），頁4-5。

具客觀性質的歷史紀錄元素之一，方便具體比對。再者，時間描述也能作為評估各種紀錄差異程度的尺標，除了記載的詳簡外，諸說如有不同，之間差異程度可以具體衡量。復次，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有發生時間，不過死亡僅在瞬間，沒有起迄問題，這能減少紀錄者的主觀判定或書寫筆法的影響，也使死亡時間的討論更能聚焦於各家紀錄對於金事內容的掌握程度。最後，金人死亡的紀錄數量相對龐大，可以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

本文將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為主要的觀察範圍。《要錄》約於開禧元年（1205）成書，記載了建炎元年（1127）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之間共三十六年的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時期歷史，其中也含括了此時的重要金事。<sup>3</sup> 由於目前學界對於宋方文獻金事紀錄的利用常以探究史實為主，在《要錄》所據資料至今仍多可見的情形下，學界討論常是直接回溯史源，《要錄》便總是追尋資料的橋樑，不是觀察宋方文獻金事紀錄的重點。然而《要錄》既是博採眾說而成，也是撰者李心傳（1167-1244）用心考辨人眾說的成果，這些成果又被不少後代宋人所接受，隱然成為他們的金事知識範本，於是如欲系統分析宋人所知金事，基本理解宋人筆下金事紀錄的內容特性與演變發展，《要錄》的觀察有其意義。

本文擬就五部分探討。第一，《要錄》留下了哪些金人死亡時間的記載，其敘述樣貌又為何？第二，《要錄》記載的來源為何，其性質又為何？第三，《要錄》如何取捨前人眾說？第四，《要錄》所記相較於《金史》之間有何異同，其間的虛實關係為何？第五，前人說法與李心傳的取捨之道，對於《要錄》記事的影響又為何？

---

<sup>3</sup>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成書時間，學界說法不一，今從胡坤、孔學之說，詳參胡坤，〈點校說明〉，頁2、27-28 註11，文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胡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書前。又，以下使用多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版本，如未註明，皆採胡坤點校本。

## 貳、記事樣貌

基於編年體例，《要錄》需要依照時間順序登載史實，金人死亡的消息便需確認其發生時間。由於《要錄》的最小時間敘述單位乃是日期，逐日記事原最理想，但因有些事件本是長期發展，難以記在特定日期中，又有一些事件未能得到精確的發生日期，於是《要錄》對於這些事件就僅能採取較為模糊的敘述方式，在某月、某季、某年的最後留記這些事件。此時，死亡是種僅能瞬間發生於一極小時間點的現象，理想上可以逐日記事，未能詳記至日的金人死亡消息，其因便與李心傳無法獲得精確的金人死亡時間有關，而《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紀錄狀況，也呈現了李心傳對於這類消息不同的掌握程度。

《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敘述形態，可從【表一】先得基本樣貌。

排序	類型	時間	事件	出處
1.	A	1123 宣和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逝世	1：8
2.	A	1127 建炎元年六月己卯	完顏宗傑逝世	6：184
3.	E	1129 建炎三年秋	記劉彥宗已逝世	28：654
4.	E	1131 紹興元年十月乙亥	記完顏婁室已逝世	48：1008
5.	C	1132 紹興二年秋	耶律余睹被殺	58：1178
6.	C	1132 紹興二年秋	楊朴逝世	58：1179
7.	B	1135 紹興五年正月	太宗逝世	84：1602
8.	C	1135 紹興五年夏	完顏宗輔逝世	90：1747
9.	C	1136 紹興六年春	太宗皇后唐括氏逝世	99：1891
10.	C	1137 紹興七年夏	高慶裔、劉思被殺	111：2090
11.	A	1137 紹興七年七月辛巳	完顏宗維逝世	112：2101
12.	C	1137 紹興七年秋	出忽質之子、熙宗妃被殺	114：2142

13.	A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胡矢、完顏宗磐、完顏宗雋、 完顏宗英、完顏宗偉被殺	130：2437
14.	A	1139 紹興九年八月戊午	完顏昌被殺	131：2451
15.	B	1140 紹興十年九月	完顏希尹、蕭慶被殺	137：2591
16.	A	1144 紹興十四年七月戊午	王倫被殺	152：2868
17.	E	1145 紹興十五年九月壬子	記宇文虛中已被殺	154：2910
18.	B	1145 紹興十五年十月	完顏宗弼逝世	154：2915
19.	B	1148 紹興十八年九月	完顏元被殺	158：3001
20.	B	1149 紹興十九年四月	張鈞被殺	159：3018
21.	A	1149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	熙宗、完顏宗賢、完顏宗敏被殺	160： 3035-3036
22.	E	1150 紹興二十年正月甲申	記完顏充稍後逝世	161：3039
23.	E	1150 紹興二十年三月	記完顏亨、完顏撒離喝、完顏沙只已被殺	161：3046
24.	B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完顏宗本、同古辨、完顏秉德、完顏宗義、完顏宗懿被殺	161：3048
25.	D	1154 紹興二十四年	蕭裕被殺	167：3182
26.	D	1155 紹興二十五年	馮長寧被殺	170：3251
27.	A	1160 紹興三十年一月壬寅	祁宣被殺	184：3552
28.	A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癸丑	海陵王太后被殺	192：3725

29.	A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丙辰	韓汝嘉被殺	192：3726
30.	E	1161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記孔彥舟、張通古、蕭玉已被殺	192：3742
31.	A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海陵王被殺	194：3811

【表一】《要錄》中的金人死亡時間<sup>4</sup>

【表一】初步提供了兩種認識，一是時間的描述樣貌，二是人物的名單。關於時間描述，可見《要錄》能有繫於日、月、季、年等的表現型態。【表一】的三十一件事例中，有十一例能夠記至日期，本文歸為 A 類事例。A 類事例的時間描述乃是《要錄》體例下最理想的形態，其敘述原貌如下：

是日，金右副元帥、許王宗傑卒於燕山之涼澱。<sup>5</sup>

另有海陵王（1122-1161，1150-1161 在位）之死更是記至時刻，時為「夜漏未盡二鼓」，這是《要錄》所記最為詳細的金人死亡時間。<sup>6</sup>但因這種寫法頗為罕見，日期也是《要錄》最小的時間定序單位，是以本文暫將海陵王之死歸於 A 類事例。

又有繫於月份、季節、年份的事例，本文分別歸之為 B 類、C 類、D 類。B 類事例共六例，其敘述原貌可由金太宗（1075-1135，1123-1135 在位）逝世記載得知：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sup>7</sup>

<sup>4</sup> 【表一】說明：

1、「時間」一欄，年號之前的阿拉伯數字即相應之西元紀年。但求方便檢視，表中年份僅依一般對換中國年號的西元紀年換算，並未仔細根據月日換算。因此如《要錄》記熙宗逝世時間為「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實為西元 1150 年 1 月 9 日，但本表仍作「1149」。以下【表四】與正文內的西元紀年換算皆採此法，祈請讀者諒察。

2、「出處」一欄，本表據胡坤點校本標示卷頁，「1：8」即表「卷 1，頁 8」。

<sup>5</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6，頁 184。

<sup>6</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94，頁 3811。

<sup>7</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84，頁 1602。



C類事例亦有六例，其敘述如下：

是秋，……內樞密使楊朴卒。<sup>8</sup>

D類事例則有二例，其敘述如下：

金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蕭裕為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好胡謀立故遼豫王禧之孫。好胡執其使以聞，裕坐死。<sup>9</sup>

此事留於紹興二十四年（1154）末的年度大事彙記。僅知死亡年份的敘述，大概是《要錄》留有金人死亡時間的紀錄中，時間描述最為模糊的類型。

不過《要錄》中最為模糊的金人死亡時間描述，乃是僅言已逝卻無該人死亡時間的敘述，本文歸為 E 類，共收六例。E 類事例的筆法，可由劉彥宗（？-1128）之死窺得：

初金人之始用兵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於燕京，以劉彥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即雲中府。】以時立愛主之。【彥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元年八月末。】虜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彥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sup>10</sup>

引文中【】內敘述為《要錄》的小字夾註，以下引用皆同。這是《要錄》最早出現的劉彥宗死亡描述，事繫建炎三年（1129）秋。相對而言，《金史》記劉彥宗逝於天會六年（1128）十月癸酉。<sup>11</sup> E 類事例的敘述已難得知李心傳能否掌握該人確切的死亡時間，但因留下死亡消息，遂是附收備覽。然而，一是這種事例通常隱藏在其他主題的敘述中，如劉彥宗之死便是金朝整併兩樞密院之事的背景描述，此使相關事例難以盡收；二是某些人物的死亡消息，其敘述頗有歷史回顧的性質，已難視為是種盡力貼近事發時間的描述。例如《要錄》曾在金熙宗（1119-1150，1135-1150 在位）被害的敘述後說其晚年濫殺事蹟，內有兵部尚書賽居常等人被殺之事，這就應該僅是一種回顧性質的描述。<sup>12</sup> 由於 E 類事例的性

<sup>8</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58，頁 1179。

<sup>9</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7，頁 3182。

<sup>10</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8，頁 654。

<sup>11</sup>（元）脫脫等，《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3，〈太宗〉，頁 59。

<sup>12</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0，頁 3035。

質複雜，不易客觀設定收取標準，【表一】便僅能輯錄部分較有討論價值的事例作為參照。相對而言，直書死亡時間的事例，【表一】收錄相對完整。

《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掌握程度，可與性質與紀錄範圍相近的南宋史書相互比較。現存的南宋史書中，可得《中興小曆》（以下簡稱《小曆》）、《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宋史全文》等三書能有較多的金初記事。初步觀察，三書中能對金人死亡時間詳記至日的事例，《小曆》有紹興九年（1139）七月三日和什等人被殺、紹興十九年（1149）十二月十一日熙宗被殺、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二十七日海陵王被殺等三事；<sup>13</sup>《會編》有建炎元年（1127）六月二十一日完顏宗望（?-1127）逝世、紹興九年（1139）八月十一日完顏昌（?-1139）被殺、紹興三十一年（1161）八月十三日海陵王太后被殺、同年八月十五日韓汝嘉被殺、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海陵王被殺等五事。<sup>14</sup>

至於《宋史全文》，所載金事應是藉由《兩朝聖政》轉承《要錄》。<sup>15</sup>在金人死亡的敘述中，《宋史全文》並未超越《要錄》，其事件主體大都保留，變更之處多僅如涉事人員名單等細節，變更手法又以刪削為主，僅有金太祖（1068-1123，1115-1123 在位）之逝繫於宣和五年（1123）五月而未言日，其死亡時間描述與《要錄》不同。此外，另有祁宣被殺未載。最終，《宋史全文》留下了九件精確繫日的記載。<sup>16</sup>整體而言，《要錄》算是現存留有大量金初人事的南宋史書

<sup>13</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 27，頁 1a；卷 34，頁 4b；卷 40，頁 11a。和什，《要錄》作「胡矢」。又，《中興小紀》原名《中興小曆》，後避清高宗諱改名。對於本書書名，本文正文敘述皆作原名，註釋出處則依出版項書名。

<sup>14</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08，頁 11b；卷 197，頁 7a；卷 231，頁 1b。另，《會編》將太祖逝世繫於宣和五年六月九日後，將高慶裔與完顏宗翰之死繫於紹興七年八月五日。由於《會編》是在上述日期後別起一段再敘，因此不確定徐夢莘是將三人之死繫於上述日期，或是附繫其後。如是繫於該日，則《會編》將有七件能夠精確繫日的記載。兩事分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3b；卷 178，頁 5b-6a。

<sup>15</sup>已有學者指出，在高孝兩朝記事部分，《宋史全文》基本採錄宋末成書之《兩朝聖政》，《兩朝聖政》則以官修之《高宗聖政》、《孝宗聖政》為主，改以編年紀事，並增《要錄》等書之內容。見孔學，〈前言〉，文收（宋）佚名撰，孔學輯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書前，頁 2-27；汪聖鐸，〈點校說明〉，頁 7-10，文收（宋）佚名，《宋史全文》（汪聖鐸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書前，頁 1-14。至於高宗朝金事，雖然未有溯其史源的研究，但初步比對，《兩朝聖政》與《宋史全文》的敘述多與《要錄》雷同，且其中內容甚多李心傳考證的結果，尤其是事件的發生時間，因此《宋史全文》的金事敘述主要應是來自《要錄》。

<sup>16</sup>太祖逝世，見（宋）佚名，《宋史全文》，卷 14，〈宋徽宗〉，頁 975。其餘九事，分見卷 16 上，〈宋高宗一〉，頁 1052-1053；卷 20 上，〈宋高宗十〉，頁 1503；卷 20 下，〈宋高宗十二〉，頁 1588、1589；卷 21 中，〈宋高宗十四〉，頁 1690；卷 21 下，〈宋高宗十五〉，頁 1738；卷 23 上，〈宋高宗十八〉，頁 1891、1892；卷 23 上，〈宋高宗十八〉，頁 1910。

中，能有最多精確繫日的金人死亡時間之作。進而比起《要錄》之前的史書，繼承《要錄》的《宋史全文》能夠因此留下了更多的精確繫日描述，又見在南宋史書的金事紀錄流傳歷程中，至少在金人死亡時間的部分，《要錄》略有一種傳承樞紐的地位。

《要錄》留下死亡時間的金人身份可分兩大類，一是女真權貴，二是降金的漢人與契丹人，前者佔多數，宗室成員又為大宗。這些留下死亡時間的金人多屬政壇要員，其逝世自是金朝重要的政治消息，這也應是《要錄》留記的原因。這是從《要錄》的紀錄現象所得的觀察，但如與《金史》記載及現今可知的金史知識相較，《要錄》留記的標準又有點模糊。首先，時間描述的詳簡狀態與亡者的身份地位並無太多關係。如身為君主的太宗，其死亡時間僅能繫於月份，這種敘述方式既不像太祖、熙宗、海陵王等其他金朝君主一般精確繫日，也比一些精確記載死亡時間的金朝官員還要模糊。再者，《要錄》對於紀錄對象的選取，標準也非僅是能否深刻影響宋金關係與金朝政局，而這應是《要錄》留下金事的初衷。<sup>17</sup> 如果《要錄》意在留下重要消息，太祖庶長子、熙宗養父，也是金朝漢式國家體制奠基者的完顏宗幹（？-1141），其死訊應可敘述，但卻無。<sup>18</sup> 類似的未記人物又還有劉豫（1073-1146）與田穀（？-1147）。<sup>19</sup> 相對而言，《要錄》卻收入了出忽質之子與熙宗妃的被殺事件，但此事與兩人事蹟在《金史》未見，被殺又為私通所致，《要錄》也無後續發展的描述，所以即便真有此事也僅宮闈醜聞，並非重要大事。<sup>20</sup> 現在看來，留記與否及敘述詳簡的標準，恐怕不全然是基於事件本身的價值，也與李心傳能否取得該事消息有關，《要錄》的資料來源

<sup>17</sup> 目前未見《要錄》序言，已難直接由李心傳的自述得知《要錄》的撰述動機，但學界多由《雜記》的自序，推測其撰述初衷應是為了彰顯宋朝的中興事功。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序〉，頁3，乙集，〈序〉，頁481；聶樂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7），頁21；王瑞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略論〉，王瑞來，《文獻可征——宋代史籍叢考》（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頁96-97。於是金國消息的收入，應是這些消息能有呈現宋金關係與金朝政局的作用。

<sup>18</sup> 完顏宗幹事蹟，詳參張博泉等著，《金史論稿》，第2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47-68。

<sup>19</sup> 劉豫事蹟，（元）脫脫等，《金史》，卷77〈劉豫〉，頁1759-1761；（元）脫脫等，《宋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75，〈叛臣上·劉豫〉，頁13793-13802。劉豫死亡時間，《金史》記為皇統六年（1146）九月戊寅，《宋史》記為紹興十三年（1143）六月。考量《金史》乃以〈熙宗本紀〉繫事，且詳至日期，加上劉豫逝於金朝，《金史》所載應為真，見（元）脫脫等，《金史》，卷4，〈熙宗〉，頁82。田穀事蹟，詳參陶晉生，〈金代的政治衝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1分（1971），頁145-146。

<sup>20</sup> 出忽質之子與熙宗妃的身份，詳見後文說明。

應是對其描述成果具有初步篩選的作用。

## 參、資料來源

《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敘述，多有資料來源的說明。【表二】整理了《要錄》在金人死亡時間的敘述中，明言利用或可能參考的資料來源。為了方便比對，【表二】僅列留有死亡時間的二十五事，未收不記死亡時間的 E 類事例。

事件	資料來源	
	時間相同	時間不同或不明
太祖逝世	「諸書」	《金太祖實錄》：天輔七年八月乙未日（15）。 <sup>21</sup> 《會編》：事繫宣和五年六月九日後。 <sup>22</sup>
完顏宗傑逝世	《金虜節要》 <sup>23</sup> 《會編》 <sup>24</sup>	《燕雲錄》：丁未年（1127）七月二日。 《小曆》：事繫建炎元年六月壬午日（24）後。 <sup>25</sup>
耶律余睹被殺		《小曆》：紹興二年九月。 <sup>26</sup> 《松漠紀聞》：某年九月。 <sup>27</sup>
楊朴逝世		
太宗逝世	《神麓記》	《金虜節要》：紹興四年冬。

<sup>21</sup> 太祖逝日，《要錄》引《實錄》言「己未」，《會編》引《實錄》言「乙未」，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6b。天輔七年八月無己未，有乙未，表格據《會編》改。

<sup>22</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頁 3b-6b。

<sup>23</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08，頁 11b。《要錄》於宗望逝世事後註明《金虜節要》與《松漠紀聞》乃為所據，因《松漠紀聞》未載宗望逝世時間，僅引《金虜節要》之《會編》則繫宗望逝世之日為六月二十一日，《要錄》繫日亦是六月二十一日（己卯日），因此雖然現存之《金虜節要》殘文並無宗望逝世時間，《金虜節要》應為《會編》、《要錄》之依據。

<sup>24</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08，頁 11b。

<sup>25</sup>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 1，頁 15b。

<sup>26</sup>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 13，頁 8b-9a。

<sup>27</sup> （宋）洪皓，《松漠紀聞》（張劍光、劉麗整理，全宋筆記第 3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 123。

	《小曆》 <sup>28</sup>	「別書」：丙辰年（1136）。 《會編》：事繫紹興四年十二月末。 <sup>29</sup>
完顏宗輔逝世		
唐括氏逝世		
高慶裔、劉思被殺		《小曆》：紹興七年四月末。 <sup>30</sup> 《會編》：事繫紹興七年八月五日後。 <sup>31</sup> 《金虜節要》：不明。 <sup>32</sup>
完顏宗維逝世		「金中雜書」：丁巳年（1137）十月二十一日。 <sup>33</sup> 《小曆》：紹興七年四月末。 <sup>34</sup> 《會編》：事繫紹興七年八月五日後。 <sup>35</sup>
出忽質之子、熙宗妃被殺		
胡矢、完顏宗磐、 完顏宗雋、完顏宗英、完顏宗偉被殺	〈誅宋兗諸王詔〉 《容齋三筆》 <sup>36</sup> 《松漠紀聞》 <sup>37</sup> 《小曆》 <sup>38</sup> 《會編》 <sup>39</sup>	

<sup>28</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18，頁1b-2a。

<sup>29</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65，頁9b-10b。後引《金虜節要》、《神麓記》記太宗逝世事，《金虜節要》應即《會編》所據。

<sup>30</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21，頁8b。

<sup>31</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8，頁5b。後引《金虜節要》記高慶裔被殺事，但未言死亡時間。

<sup>32</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8，頁6a。

<sup>33</sup>此述留於高慶裔等人被殺事後。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11，頁2091。

<sup>34</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21，頁8b。

<sup>35</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8，頁6a。後引《金虜節要》記完顏宗翰之死，但未言死亡時間。

<sup>36</sup>（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三筆〉，卷5，「北虜誅宗王」條，頁476。

<sup>37</sup>（宋）洪皓，《松漠紀聞》，頁136。

<sup>38</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27，頁1a。

<sup>39</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66，頁9b-10a。但內無胡矢被殺之述。

完顏昌被殺	《金虜節要》 <sup>40</sup> 《會編》 <sup>41</sup>	《小曆》：紹興九年七月己卯日（12）。 <sup>42</sup> 《征蒙記》：皇統元年。 <sup>43</sup> 《神麓記》：不明。 <sup>44</sup> 《中興遺史》：不明。 <sup>45</sup>
完顏希尹、蕭慶被殺	《松漠紀聞》 <sup>46</sup>	《神麓記》：不明。 《小曆》：紹興九年七月。 <sup>47</sup> 〈誅完顏希尹詔〉：不明。 《金虜節要》：不明。 <sup>48</sup> 《會編》：紹興九年七月。 <sup>49</sup>
王倫被殺	〈王倫行述〉 <sup>50</sup>	《小曆》：紹興十四年七月。 <sup>51</sup> 《會編》：紹興十四年十二月。 <sup>52</sup>
完顏宗弼逝世	《征蒙記》 《會編》 <sup>53</sup>	
完顏元被殺	《小曆》 <sup>54</sup>	〈誅蕭裕詔〉：不明。

<sup>40</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7a-b。

<sup>41</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7a。後引《金虜節要》、《神麓記》、《中興遺史》、《征蒙記》記完顏昌被殺事，引《金虜節要》與《征蒙記》記被殺時間。《金虜節要》應即《會編》所據。

<sup>42</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27，頁1b。

<sup>43</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11b-12a。

<sup>44</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8a。

<sup>45</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8b-9a。

<sup>46</sup>（宋）洪皓，《松漠紀聞》，續，頁130。

<sup>47</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27，頁6a-b。後引〈誅完顏希尹詔〉殘文數句，但未言被殺時間。

<sup>48</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1a-2a、5b-7a。

<sup>49</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頁1a。後引《金虜節要》、《神麓記》、《松漠紀聞》記完顏希尹被殺事，僅《松漠紀聞》有被殺時間，但《會編》未採其說。

<sup>50</sup>《要錄》在王倫被殺處並未說明所據史料，但《要錄》曾引〈王倫行述〉，雖然未及王倫被殺事，但知〈王倫行述〉乃《要錄》史源之一，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71，頁1379。乾道年間，曾有鍾松撰〈王倫行狀〉，（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四明樓氏家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卷100，〈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頁1-17。《要錄》所引行述疑即行狀前身。行狀今佚，但據行狀所撰之神道碑銘有王倫於紹興十四年七月戊午日被殺之述。因《要錄》繫王倫此時被殺，且無其他《要錄》曾引資料記有相同時間，故推《要錄》記載應是來自〈王倫行述〉。又，神道碑銘成於嘉定四年，已在《要錄》成書之後而非《要錄》史源。

<sup>51</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31，頁12b。

<sup>52</sup>《會編》於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後引《中興姓氏錄》記王倫被殺事，未言歲月。疑徐夢莘繫此乃依年而非月。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13，頁11b。

<sup>53</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15，頁11a-16a。後引《征蒙記》記宗弼逝世事。

<sup>54</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33，頁10b-11a。

		〈廢亮詔〉：不明。
張鈞被殺	《神麓記》	
熙宗、完顏宗賢、 完顏宗敏被殺		〈大定改元大赦詔〉：不明。 《神麓記》：不明。 《小曆》：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己未日 (11)。 <sup>55</sup> 《會編》：事繫紹興十九年十二月。 <sup>56</sup>
完顏宗本、同古 辨、完顏秉德、完 顏宗義、完顏宗懿 被殺		〈誅宗本詔〉：不明。 〈誅蕭裕詔〉：不明。 「金國雜書」：不明。
蕭裕被殺	〈誅蕭裕詔〉	
馮長寧被殺	《弒亮錄》 <sup>57</sup>	
祁宣被殺	《正隆事迹記》 <sup>58</sup>	《煬王江上錄》：正隆二年八月。 <sup>59</sup> 〈大定改元大赦詔〉：不明。
徒單氏被殺	《會編》 <sup>60</sup>	《正隆事迹記》：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sup>61</sup> 《小曆》：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sup>62</sup>
韓汝嘉被殺		《會編》：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sup>63</sup>
海陵王被殺	《金人敗盟記》	《中興遺史》：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申

<sup>55</sup>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34，頁4b。

<sup>56</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16，頁9b。後引《神麓記》記熙宗等人被殺事。

<sup>57</sup> 馮長寧被殺事，胡坤與辛更儒之點校本《要錄》在其正文後皆無小註，但中華書局標點本與臺灣國家圖書館清抄本之《要錄》皆有「此據弒亮錄」的小字夾註，本表據此補。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70，頁2799；(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清抄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出版時間不明，索書號20225101860)，卷170，頁2884。又，上引國圖清抄本，胡坤指出當為《要錄》現存最早版本，見胡坤，〈臺灣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版本蠡測〉，《文史》，2018年第2期(2018)，頁87-106。

<sup>58</sup> 《要錄》引《正隆事迹記》即記祁宰於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被殺，但小註作「壬寅，二十五日也」，壬寅應為二十三日。又，《會編》所抄《正隆事迹記》記祁宰於庚申年被殺，事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2，頁11b-12a。

<sup>59</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3，頁4。

<sup>60</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0，頁17a-b。本段無引據。

<sup>61</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2，頁13b-14a。

<sup>62</sup>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40，頁4b。

<sup>63</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1，頁1b。本段無引據。

<p>《神麓記》 〈虞允文神道 碑〉 《小曆》<sup>64</sup> 《采石斃亮記》 <sup>65</sup></p>	<p>日（28）。 《采石戰勝錄》：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sup>66</sup> 《正隆事迹記》：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sup>67</sup> 《煬王江上錄》：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sup>68</sup> 《會編》：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sup>69</sup></p>
--	---

【表二】《要錄》中金人死亡消息的資料來源<sup>70</sup>

分析之前，需先對【表二】內容補充三點說明。第一，對於金人死訊，《要錄》常有連同相關史事一併敘述的情形，於是其後所述的資料來源，便有部分乃是他事根據，本表因此有所篩選，僅留有關資料。如太祖逝世事，《要錄》就與太宗即位及宗翰身份等事合併敘述，最後小字夾註所言的《金太祖實錄》、《金人亡遼錄》、《舊帳行程錄》、《松漠紀聞》、《靖康日曆》、《欽宗實錄》、《金虜節要》、《金志》、《神麓記》等九種資料，便僅有《金太祖實錄》是用以確認太祖的死亡時間，其餘則是用以確認太宗之名與宗翰的身份。<sup>71</sup> 因此上述九書，本表僅留《金太祖實錄》。第二，《要錄》稱《金太祖實錄》所載太祖逝世時間「與諸書皆不同」而不取，由於目前可知能為《要錄》參考之資料並無

<sup>64</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40，頁11a。

<sup>65</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1，頁11b。

<sup>66</sup>（宋）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2，頁8a。

<sup>67</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2，頁16a。

<sup>68</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3，頁8a-9a。

<sup>69</sup>（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1，頁1a。後引《遺史》、《敗盟記》、《神麓記》、《斃亮記》、《戰勝錄》、《正隆事迹》、《江上錄》7書，皆有被殺時間之述。《會編》當據《中興遺史》。

<sup>70</sup>【表二】說明：

1、「姓名」一欄，灰底者乃《要錄》所記死亡時間與《金史》相同之人。

2、「資料來源」兩欄的字體，新細明體為《要錄》明言之資料來源，標楷體為《要錄》未言但可能引用或參考的資料來源。

3、如為《要錄》明言來源之史料，由於原文皆在《要錄》對於該件事例的敘述之後，出處可參【表一】；如為《要錄》未言，則詳註出處。

4、所參諸書所記時間如與《要錄》相同，將僅留所參諸書之名；如果不同，書名後將附上該書所記時間。

<sup>71</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頁8。



《要錄》所記之太祖逝世時間，「諸書」因此不明，表中也僅以「諸書」之名登載。類似的不明資料，又有太宗逝世事的「別書」，以及高慶裔等人被殺事的「金中雜書」，以及完顏宗本等人被殺事的「金國雜書」。

第三，【表二】試著收集李心傳應該可見且其中亦記金人死亡時間的資料，這些資料李心傳可能參考，但未言。如完顏宗磐等人被殺事，《要錄》便以夾註引用《容齋三筆》抄錄之金朝〈誅宋兗諸王詔〉，此詔應即《要錄》敘事根據。然而今存《容齋三筆》所摘詔文「……，群兇悉殄。已各伏辜，……」的敘述，在亦有摘錄此詔的《松漠紀聞》與《要錄》中，所留敘述皆是「……，群兇悉殄。於今日三日，已各伏辜，……」，《容齋三筆》漏抄了「於今日三日」一句。<sup>72</sup>《要錄》明言本段使用了《容齋三筆》，但因《要錄》能夠詳說宗磐等人被殺時間，《容齋三筆》的摘錄詔文卻無月日之述，《松漠紀聞》與《會編》又也是《要錄》的參考依據，若非《容齋三筆》今本的文句已有佚失，便是《要錄》其實是參考了《松漠紀聞》與《會編》等書。又如太祖的逝世，《要錄》雖然在該則敘述之後未說曾經參考了《會編》，但因《要錄》他處亦曾引用《會編》，而《會編》也有太祖逝世時間的記載，【表二】遂收《會編》所記。<sup>73</sup>

【表二】中，扣除內容不明的「金中雜書」、「金國雜書」、「諸書」，可得《要錄》能以二十三種資料確認金人的死亡時間，內有七篇文章，十六種書籍。不過，馮長寧被殺處的引據《弑亮錄》，連同《要錄》僅一次引用的《殺亮錄》，<sup>74</sup>由於兩名類近《采石斃亮記》的簡稱《斃亮錄》，<sup>75</sup>加以敘事範圍重合，

<sup>72</sup> (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5，「北虜誅宗王」條，頁476；(宋)洪皓，《松漠紀聞》，頁136；(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66，頁9b-10a。

<sup>73</sup> 另外，尚有《要錄》成書前即已出版的《歷代紀年》亦記太祖、太宗、熙宗之逝世年份，李心傳或可參考。不過，未見《要錄》及其參引著作言及《歷代紀年》，李心傳應未看過《歷代紀年》。《歷代紀年》，晁公邁(?-1137)撰，共10卷，其自序與卷1已佚，今僅存卷2至卷10。《直齋書錄解題》記該書自序繫於紹興七年(1137)。今存書後有晁公邁姪子綺於淳熙二年(1175)及包履常於紹熙三年(1192)所撰序文，可知晁子綺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抄得是書，紹熙三年刻印出版。《歷代紀年》記太祖逝於宣和四年(1122)、太宗逝於紹興五年(1135)、熙宗逝於紹興二十年(1150)。由於熙宗事蹟晚於自序繫年，程尼娜認為此處敘述應是後人增補。《歷代紀年》所記，太宗逝年與《要錄》同，太祖逝年早《要錄》一年，熙宗逝年則晚《要錄》一年，而其太祖、熙宗之逝皆異於目前可見諸說。(宋)晁公邁，《歷代紀年》(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史部，第2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三年盱江郡齋刻本影印)，卷10，頁19、33、34。(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頁117。程尼娜，〈《金史》「纂改開國史」辨〉，頁13。

<sup>74</sup>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75，頁3363。

<sup>75</sup> 簡稱《采石斃亮記》為《斃亮錄》，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94，頁3798。

且未見類似書名之作，《弑亮錄》、《殺亮錄》可能應皆《采石斃亮錄》，因此本文先視三名為同書異稱，《要錄》能夠參引的書籍便暫計為十五種，資料總數則為二十二種。

這二十二種資料的記載範圍落差甚大，有者僅對特定事件而作，提供的金人死亡時間數量也較有限。如《采石斃亮記》、《采石戰勝錄》、《正隆事迹記》、《煬王江上錄》、《金人敗盟記》等五書皆為海陵王南侵而作，記事範圍至多溯及海陵王的即位，因此也僅能提供海陵王在位期間的金人死亡時間。類似情形又有金朝詔書，所述僅是特定事件。但有部分資料的記事範圍較廣，尤其是《金虜節要》、《神麓記》、《會編》、《小曆》等四種，前兩書類近金朝要聞彙記，後兩書則是宋高宗朝之編年全史，四書中的金人死亡消息便較為大量。

這些資料的形成背景亦是多元，對此可由作者身份與完成時間觀察。七篇文章中，〈誅宋兗諸王詔〉、〈誅完顏希尹詔〉、〈誅宗本詔〉、〈誅蕭裕詔〉、〈廢亮詔〉、〈大定改元大赦詔〉等六種為金朝詔書，作者自是金人，頒布間也應皆在詔中事件發生後不久。<sup>76</sup>〈虞允文神道碑〉為宋人撰述，《誠齋集》有收，作者楊萬里（1127-1206）記碑文乃為虞允文（1110-1174）葬後二十八年所撰，或於嘉泰（1201-1204）年間成文。<sup>77</sup>至於十五種書籍的完成時間與作者身份，下以【表三】通說：

作者	著作	成書時間	作者身份
趙子砥	燕雲錄	約於建炎二年（1128）後不久成書。 <sup>78</sup>	宋人，靖康元年（1126）被俘，明年入金，建炎二年逃歸。

<sup>76</sup> 目前未見〈廢亮詔〉，但有〈大定改元大赦詔〉。〈大定改元大赦詔〉殘文，《神麓記》有收，《會編》與《要錄》皆錄，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33，頁 2a-6b；（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93，頁 3753-3755。因〈大定改元大赦詔〉乃為廢亮而作，其中也有完顏元被殺事，頗疑兩詔實同一詔，唯無其他證據前，表二仍暫分兩詔說明。

<sup>77</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52-2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日本鈔宋本縮印），卷 120，〈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諡忠肅虞公神道碑〉，頁 1a-22a。

<sup>78</sup> 趙子砥經歷與《燕雲錄》成書經過，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98，頁 9a-10a。

張匯	金虜節要	約於紹興十年（1140）後不久成書。 <sup>79</sup>	宋人，約於靖康元年被俘留金，紹興十年逃歸。
完顏晟等編撰	金太祖實錄	皇統八年（1148）成書。 <sup>80</sup>	金人。
洪皓	松漠紀聞	正編與續編為紹興二十六年（1156）編成，補遺為乾道九年（1173）輯出。本書乃洪皓口述，其子筆錄，口述時間應在洪皓南貶至逝世期間，即紹興十七年（1147）至二十五年（1155）間。 <sup>81</sup>	宋人，建炎三年使金遭留，紹興十三年（1143）放歸。
蹇駒	采石斃亮記	初稿約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撰成，重修本約於乾道年間成書。 <sup>82</sup>	宋人，曾為虞允文門士，應未入金。
員興宗	采石戰勝錄	初稿約於紹興三十二年撰成，重修本約於隆興元年（1163）至乾道六年（1170）間成書。 <sup>83</sup>	宋人，曾任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應未入金。

<sup>79</sup> 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3分（1936），頁293-294。

<sup>80</sup> （元）脫脫等，《金史》，卷4，〈熙宗〉，頁84。

<sup>81</sup> 《松漠紀聞》的成書與刊行，見洪适、洪遵書跋，文收（宋）洪皓，《松漠紀聞》，頁138-139、141-142。洪皓生平，詳參外山軍治，〈松漠紀聞の著者洪皓について〉，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67），頁629-654。在金活動，詳參趙永春，〈洪皓使金及其對文化交流的貢獻〉，《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1997），頁9-14。關於洪皓之名，雖然一般史料多作「皓」，從白從告，但據王德毅考證，其名實為「皓」，從日從告。詳參王德毅，〈洪容齋先生年譜〉，王德毅，《宋史研究集》，第2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頁408。考量到部分史籍與早年研究仍用「皓」，本文以下使用，一般敘述皆用「皓」，如為書名或論文名，則依照原出處用字。

<sup>82</sup> 今有《采石瓜洲斃亮記》及《采石斃亮記》兩種，蒙文通認為兩書皆為蹇駒所作，前書乃初修本，紹興三十二年二月至六月間成稿，隆興元年成書；後書是重修本，應於乾道刊行。見蒙文通，〈從采石瓜洲斃亮記認識到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1955），頁159-165。趙維國則認為兩書作者並非同人，《采石瓜洲斃亮記》為蹇駒所撰，《采石斃亮記》作者則不明，見趙維國，〈《采石瓜洲斃亮記》點校說明〉、〈《采石斃亮記》點校說明〉，上海師範古籍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267、285。蒙文通論說有據，本文採其說法。

<sup>83</sup> 《戰勝錄》亦有兩本，蒙文通認為語體本乃紹興三十二年寫成，後再改訂為文言本，並於其中增入了《斃亮記》隆興元年初修本的內容。見蒙文通，〈從采石瓜洲斃亮記認識到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頁161-162。員興宗逝世時間不明，但因乾道六年有祭文，疑逝於此時。見〈金山住持印老祭員興宗文〉，文收（宋）員興宗，《九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附錄，頁5a-7a。據此，《戰勝錄》文言本成書時間應在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間。

苗耀	神麓記	約於宋孝宗朝成書。 <sup>84</sup>	歸正人，金世宗時入宋。 <sup>85</sup>
趙甦之	中興遺史	紹熙五年（1194）成書之《會編》有引，應於此前成書。後於慶元（1195-1200）年間進呈宋廷。 <sup>86</sup>	宋人，應未入金。
張棣	正隆事迹記	淳熙（1174-1189）末年至紹熙五年間成書。《會編》有引。	歸正人，疑為遼地漢人，約 1190 年前後來宋。 <sup>87</sup>
佚名	煬王江上錄	《會編》有引，紹熙五年前成書。	不明。
佚名	征蒙記	《會編》有引，紹熙五年前成書。	書疑託名偽作，編者或為書商。 <sup>88</sup>
晁公忞	金人敗盟記	《會編》有引，紹熙五年前成書。	不明。
熊克	中興小曆	約於淳熙十二年（1185）至嘉泰二年（1202）間成書。 <sup>89</sup>	宋人，應未入金。

<sup>84</sup> 《神麓記》成書時間，因《會編》所摘佚文最晚記事為大定二年海陵王完顏亮位號遭貶之事，估計當在宋孝宗時期成書。《神麓記》記載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41，頁 5 下。完顏亮位號遭貶時間見（元）脫脫等，《金史》，卷 5，〈海陵〉，頁 117。

<sup>85</sup> 苗耀，薛瑞兆推測為歸正人，劉浦江指為金世宗時期入宋。詳參薛瑞兆編著，《金代藝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363；劉浦江，〈關於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頁 7。

<sup>86</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4，頁 119-120。許起山進一步指出，《中興遺史》約於乾道五年至淳熙年間之間成書。《中興遺史》成書時間與趙甦之生平，詳參許起山，〈輯校前言〉，文收（宋）趙甦之撰，許起山輯校，《中興遺史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書前，頁 1-9。

<sup>87</sup> 張匯，陳振孫記為「淳熙中歸明人」，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5，頁 140。張棣歸宋時間，劉浦江指為淳熙（1174-1189）末年，孫建權指為紹熙（1190-1194）年間，分見劉浦江，〈范成大《攬轡錄》佚文真偽辨析〉，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 413-414；孫建權，〈關於張棣《金虜圖經》的幾個問題〉，《文獻》，2013 年第 2 期（2013），頁 133-139。

<sup>88</sup> 趙宇，〈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補正〉，《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2 輯（2017）頁 160-169。

<sup>89</sup> 淳熙十二年，熊克罷官後始撰《小曆》，見（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陀粹編·續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粹編〉卷 27，〈天定錄卷中〉，「乞付史館堂札」，頁 1108。嘉泰二年，有商人欲攜《小曆》渡淮，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 6，「嘉泰禁私史」條，頁 149-150。兩事討論，分見周立志，〈《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與《中興小曆》之關係〉，《文獻》，2010 年第 3 期（2010），頁 104-112；李海燕，〈試論熊克《中興小紀》的史料來源與流布過程〉，《新鄉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3 期（2012），頁 67-70。據此，《小曆》成書時間應在淳熙十二年至嘉泰二年之間。

徐夢莘	三朝北盟會編	紹熙五年成書。 <sup>90</sup>	宋人，應未入金
洪邁	容齋隨筆	《容齋三筆》，慶元二年（1196）成書。 <sup>91</sup>	宋人，曾使金。

【表三】《要錄》史源一覽（略依成書先後排序）<sup>92</sup>

這十五書中，除了金朝官書《金太祖實錄》外，其餘十四書皆是在宋之作，可以視為宋方文獻。這些宋方文獻的作者，部分曾經長期在金生活。中有不知故國者，如苗耀；有者可能原為遼人，如張棣；有者原為宋人，或曾被俘，如趙子砥、張匯，或曾使金被留，如洪皓（1088-1155）。部分曾經短暫入金，如洪邁（1123-1202）便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曾任賀登位使出入金朝。<sup>93</sup> 有者已知並無在金經歷，如蹇駒、趙甦之、員興宗、虞允文、熊克、徐夢莘，以及《征蒙記》的編著者等人。最後，晁公忞與《煬王江上錄》編著者的經歷不明，但疑為宋人且無在金活動經驗。<sup>94</sup> 成書時間亦可留意。這十五部著作，《燕雲錄》為宋高宗在位前期，也就是金太宗在位中晚期成書；《金虜節要》與《金太祖實錄》為宋高宗在位中期，即金熙宗時期成書；《松漠紀聞》為宋高宗在位後期，即海陵王時期成書；《采石斃亮記》、《采石戰勝錄》、《神麓記》等三種，為宋孝宗（1127-1194，1162-1189 在位）時期，即金世宗時期成書；《中興遺史》、《小曆》、《會編》、《容齋三筆》等四種，則為宋光宗（1147-1200，1189-1194 在位）朝至宋寧宗（1168-1224，1194 即位）在位前期，即金章宗（1168-1208，

<sup>90</sup> 書序繫紹熙五年，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首，〈三朝北盟會編序〉。

<sup>91</sup> 書序繫慶元二年，見（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序〉，頁 417。

<sup>92</sup> 【表三】說明：非為《要錄》在金人死亡時間敘述中明言利用的資料，表中於「著作」一欄以標楷體標示其書名。

<sup>93</sup> 洪邁使金，事見李輝，《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81。

<sup>94</sup> 《金人敗盟記》曾言金使入宋尋釁事，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28，頁 1a-4b。觀其內容與筆法，晁公忞疑為宋人。《煬王江上錄》，雖然四庫館臣以書中「煬王」之語推斷作者乃是金人，但余嘉錫亦指「虜主」、「大宋」等語「非金人之詞」。另於此書殘文中，除了甚多戲劇性對話而類宋人小說家言外，也有稱海陵王為完顏宗翰之子、征宋金軍總數共 297 萬人等遠離金朝實況之敘述。整體而言，此書恐非紀實之作，作者也疑為宋人。（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52，〈史部八 雜史類存目一〉，「煬王江上錄」，頁 47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5，〈雜史類存目一〉，「煬王江上錄」，頁 295-296。《煬王江上錄》殘文，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43，頁 1a-9b。

1189 即位) 時期成書。至於《征蒙記》、《正隆事迹記》、《煬王江上錄》、《金人敗盟記》等四種較難斷言，唯因皆獲《會編》引用，成書時間必不晚於紹熙五年，後三書又因皆記海陵王死訊，成書時間應在海陵王逝後，《征蒙記》則因有天德三年（1152，紹興二十二年）事，成書時間應在此後。<sup>95</sup>

## 肆、取捨之道

這十五書七文等二十二種資料是目前可知李心傳敘述金人死亡時間的根據。《要錄》在各事之中，對於這些資料的利用情形頗有落差。有些事件註明了參考多種資料，如太祖之逝；有者僅註明一種參引資料，如張鈞被殺；有者則未見參引資料，如完顏宗輔之逝。對於已經註明參引的資料，《要錄》的利用方法有引用其說與參考而未引用等兩種。加上可能引用與可能參考等兩種方法，《要錄》便有四種資料利用情形。【表二】以欄位與字體區隔這四種資料利用情形，「時間相同」一欄的新細明體資料即是明言引用，標楷體資料則是未言但可能引用；「時間不同或不明」一欄中，新細明體資料即是明言參考但未引用，標楷體資料則是未言參考亦未引用。

【表二】所收二十五事中，有十二事《要錄》留下了說法的來源，有十三事不明來源。在不明來源的十三事中，《要錄》記載與前人說法的關係約有以下四類。第一類是《要錄》有言可見之前人說法，唯諸說皆與《要錄》異，完顏宗維之逝、熙宗等人被殺、完顏宗本等人被殺等三事皆是。第二類是《要錄》未言可見之前人說法，但可搜得相關資料，唯諸說皆與《要錄》異，耶律余睹被殺、高慶裔等人被殺、韓汝嘉被殺等三事皆是。第三類是《要錄》未言可見之前人說法，目前亦未搜得相關資料，如楊朴逝世、完顏宗輔逝世、太宗后逝世、出忽質等人被殺等四事即是。第四類是《要錄》未言可見之前人說法，但可搜得相關資料，且有部分說法能與《要錄》同，共三事。如完顏昌被殺，《要錄》未言可見

<sup>95</sup> 《征蒙記》，陳樂素推斷當為天德三年之後成書，趙宇認為最遲應於孝宗時期已流傳宋境。見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頁 289；趙宇，〈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補正〉，頁 161。

之前人說法，不過目前能得《金虜節要》等六書記其事，《金虜節要》、《會編》、《小曆》、《征蒙記》等四書有記死亡時間，《金虜節要》與《會編》兩書所載的死亡時間與《要錄》相同。類似情形，王倫被殺、海陵王太后被殺等二事亦是。

第一至第三類共十事，【表二】中的「時間相同」一欄僅能以空白表示。這十事是目前尚難得知《要錄》紀錄依據的事例，但有部分或可推窺其說來源。耶律余睹被殺與高慶裔等人被殺兩事，可見前人說法尚比《要錄》詳細，已能記至月日。如耶律余睹被殺，《小曆》與《松漠紀聞》皆能記至九月，但《要錄》改作秋季。或可推測，《要錄》的繫於秋季可能是一種不敢輕信前說的模糊處理，相異的前人說法應即《要錄》的敘述根據。

熙宗等人被殺之事，《要錄》曾言海陵王應於天德元年（1149，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己未頒佈即位赦書，認為當時應是「丁巳殺亶，戊午立亮，己未肆赦」，指《小曆》記熙宗於己未日被殺乃誤。<sup>96</sup>此外，《小曆》曾記宋朝一時不知海陵王已經即位，需至賀金生辰使湯鵬舉抵達金朝，在紹興二十年（1150）二月经由接伴使的轉告後，宋朝才能正式得知金主更替的消息。同時，接伴使也提到當時金朝已經通報諸國相關的消息。<sup>97</sup>看來這段過程中的公開儀式與對外通報已使海陵王即位的消息傳開，而後熙宗的死亡時間也應在金朝的宣詔下達、遣使來報，以及宋朝的訪查中明朗。完顏宗翰之逝，由於茲事體大，消息也是迅速廣傳。<sup>98</sup>完顏宗本等人被殺之事，《要錄》已見多種金朝文書記載，雖然內容不明，不過或有類似〈誅宋兇諸王詔〉的時間描述可供確認。以上諸事，可能已於宋朝官方紀錄中留下記載，後為李心傳所知。最後，梁太濟曾指出《要錄》的敘事時序主體乃依《高宗日曆》而建，「正文以下未嘗加註者，十九皆可視為《日曆》遺文也」。<sup>99</sup>此說應就宋事而發，但也提供了《要錄》未言史源的金事記載來源一種可能的解釋，於是《要錄》中未見史源的金人死亡時間，可能是李心傳

<sup>96</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0，頁3036。

<sup>97</sup>（宋）熊克，《中興小紀》，卷34，頁6b-7a。

<sup>98</sup>紹興七年十一月庚戌，便有滯金宋使朱弁遣李發抵宋奏報宗翰等人的死亡消息，時約宗翰逝世後兩個月。（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17，頁2177。

<sup>99</sup>梁太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取材考〉，梁太濟，《唐宋歷史文獻研究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63-164。

透過《高宗日曆》留存的宋朝官方紀錄而得。這個說法可以解釋《要錄》並未加註來源，而所載的金人死亡時間也是正確的情形。

各種資料的運用分佈，透露出《要錄》對於各種資料的認同程度與取用原則，明言利用並承襲其說的資料是《要錄》記事的主要根據。關於《要錄》取用資料的原則，可先就宇文虛中（1079-1146）死事的考辨觀察。就在宇文虛中死事的敘述之後，《要錄》在夾註中先說其事乃據〈宇文虛中行狀〉與宇文家藏〈訴理狀〉，後說《征蒙記》及《行程錄》也有類似記載，並指兩書作者「皆北人」，「益知虛中死節無疑也」。<sup>100</sup>「益知虛中死節無疑也」一句可知李心傳已知宇文虛中並非死節的說法，但因「北人」著作的支持，最終還是採用了死節的說法。這次的判斷顯示了李心傳對於消息來源的重視，資料的「原始程度」影響了李心傳的取捨。

相對而言，雖然也見《小曆》、《會編》等史書能留大量的金人死亡消息，但《要錄》明言引用或參考的數量有限。對照《要錄》與《小曆》、《會編》的記載狀況，《小曆》有十三事可被《要錄》利用，但《要錄》明言利用者僅二事，其中完顏元被殺時間採用其說，完顏希尹等人被殺時間則參考但不用；《會編》則有十四事可被《要錄》利用，但《要錄》在這二十五件金人死亡時間的描述中全未言及。基本上，這些史書也有記載的金人死亡時間，李心傳應是直接回查當時仍然可見的更原始資料，尤其是金國的官方文書與作者能有長期在金生活經驗的著作，《金虜節要》與《神麓記》又是大宗，《要錄》明言利用兩書者各為五事與六事。

就宇文虛中死事的考辨與整體的資料利用狀況所見，可以感受到作者經歷大致是李心傳判定資料記事品質的依據，金國文書與「北人之作」也因屬於相對原始的史料而被視為較為穩當的參考對象。定奪史實時，《要錄》常藉多種資料交參考辨。只是相對於宋事常有豐富資料，可藉多書說法與諸事因果比對各說的合理性，金事卻難如此。就目前《要錄》的金事紀錄所見，相對於宋事紀錄，在金人死亡時間的描述中，除了海陵王被殺已經明確可知能有宋人諜探報告及金方直

<sup>100</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4，頁2910-2911。



接通知為憑外，<sup>101</sup>其餘諸事明言可供參考的資料有限，相關敘述也難編織出連鎖的史實因果網絡以供核對。這種現象既令《要錄》內的金事說明相對簡單，也使部分金事，如前述之忽質之子與熙宗妃的私通被殺事件，呈現著一種獨立事件的樣貌，也就是刪除不記也不影響其他金事的說明。由於不易多事互校，符合一般史學規範的「原始史料優先」確實是種合理的取用原則。

對於資料取用，《要錄》又有一些補充原則或例外作法。太宗之逝，《要錄》能夠參考《神麓記》與《金虜節要》等兩種相對原始的資料，但兩書記載不同，太宗逝世時間就相差了一年。雖然《金虜節要》成書較早，李心傳終以《神麓記》記載「頗悉」，以描述更為詳細為由判定《神麓記》的敘述為真。<sup>102</sup>這是一次以敘述詳細程度為取捨標準的作法。進而太祖之逝，「原始史料優先」就被「多數史料優先」的原則所推翻，在李心傳所見諸書中，史料價值當屬最高的金朝官書《金太祖實錄》，其說終因「與諸書皆不同」而被捨棄。<sup>103</sup>於是如有多種說法，《要錄》便可就資料性質、敘述品質、各說數量多寡等標準取決。

但也見僅見一說便記其事的情形。完顏宗弼逝世、張鈞被殺、蕭裕被殺等三事，【表二】可見《要錄》僅留一種前人說法，各來自《征蒙記》、《神麓記》、〈誅蕭裕詔〉，也皆取用。這種僅記一說的現象，需要小心是否是後世傳抄後的刪削結果。由於《要錄》現存版本皆非原本，也知清人重輯時曾經刪削了某些被視為累贅的夾註引據，故僅留一說的現象，可能便是傳抄的結果，而並非《要錄》原貌。唯就胡坤、辛更儒的點校成果所示之各家版本，以及未被前述點校成果參考，但或是目前可得之《要錄》最早版本的國家圖書館清

抄本所見，此三事似無刪削引據的痕跡。<sup>104</sup>再者，也需留意能為李心傳可見

<sup>101</sup> 海陵王被殺的消息來源，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94，頁3813、3815；卷195，頁3829、3831、3835-3836；（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41，頁2、4轉引之趙姓之《中興遺史》、晁公恣《敗盟記》。

<sup>102</sup>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84，頁1603。

<sup>103</sup> 《金太祖實錄》性質，參見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頁292-293；邱靖嘉，《《金史》纂修考》（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30-33。

<sup>104</sup> 清人刪削之例，詳參胡坤，〈臺灣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版本蠡測〉，頁87-106。對查清抄本與今知諸本，此三事文句大致相同。清抄本三事出處，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清抄本），卷154，頁2577-2578；卷159，頁2671-2672；卷167，頁2823。今知諸本文字，分見胡坤與辛更儒點校本校勘說明，胡坤本三事文字詳前出處，辛更儒本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辛更儒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卷154，頁2637；卷159，頁2738；卷167，頁2899。

的資料是否也有相關敘述，如有，此三事也非僅見一說便直接採用，不過目前可見能為李心傳參考的其他資料也無相關敘述。經由以上，此三事較有可能是李心傳僅據一說便直接採用。另一方面，《要錄》常以夾註保存某些可疑的說法或與最終不取的異說，如在完顏宗望逝世的敘述後，李心傳便抄留了《燕雲錄》的異說，並指出其說雖與他書不同，但仍姑且附記。<sup>105</sup> 考量李心傳為求「存史」而盡力抄收異說的基本原則，可以感受到即便僅有一說，當其中描述並無太多常識性錯誤或可疑之處時，寧收勿棄的作法有其道理，或因此《要錄》便留下了不少僅有一說的金事敘述。當然，這種作法需有資料條件的支持，無論是《征蒙記》、《神麓記》或〈誅蕭裕詔〉，文獻性質已獲李心傳肯定，其說方能留存。

對於金朝人事，能獲李心傳肯定的撰述不多，能夠提供豐富史實的也是稀少，這造就了一個《要錄》金事資料引用的特色，即少數史料的多次參引。《要錄》的參引諸書中，《神麓記》的使用最為顯目。在【表二】的二十五事中，便有太宗、完顏希尹等人、張鈞、熙宗等人、海陵王之死等五事明言參考《神麓記》，而太宗、張鈞、海陵王之死等三事，李心傳在眾說中選用了《神麓記》的記載，其他兩事，由於《要錄》未言是否取用，今存《神麓記》也無相關內容，無法進一步比對，目前尚難確認李心傳的態度。再以《會編》留存的《神麓記》殘文比對《要錄》的引用，除了完顏昌之死外，包括略有歷史回顧性質的熙宗晚年濫殺人員名單，所述之金人死亡事件皆獲《要錄》明言引用或參考。<sup>106</sup> 雖然《要錄》對於《神麓記》的肯定應該還要全面比對才能確認，但從金人死亡時間的取舍所見，《神麓記》在李心傳參引諸書中應是最獲信任。<sup>107</sup> 此外，《金虜節要》也被《要錄》多次參引。就表二可見，有完顏宗望、太宗之死等兩事明言參引，並於宗望之事引用其說；有高慶裔等人與完顏昌之死等兩事可能參引，而於完顏昌之事可能引用其說。不過相對於《神麓記》，《金虜節要》的參引數量略為遜色，這應與《金虜節要》的記事範圍不如《神麓記》寬廣有關，又在太宗之逝考辨結果中的屈居下風，也見《金虜節要》在李心傳的心目中，其地位次於

<sup>105</sup>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6，頁184-185。

<sup>106</sup> 今見《神麓記》殘文皆由《會編》所收，所記各事之出處詳參【表二】所示。

<sup>107</sup> (宋)李心傳對於《神麓記》的肯定，又可從其著述沿用了《神麓記》之稱宗望、宗翰為「宗傑」、「宗維」可見。目前所見，此兩名最早出自《神麓記》，同期或稍早的文獻未見。此兩名稍後又被承襲《要錄》的南宋著述所用，成為宗望與宗翰在宋地的常見名稱，見陳昭揚，〈宋人紀錄中的金太祖諸子——以「集體描述」為中心的觀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9)，頁21-22。

《神麓記》。

## 伍、敘事虛實

以下以《金史》對於《要錄》紀錄範圍中的金人死亡時間的記載，追探資料來源對於《要錄》記載的影響。對此先比對《要錄》與《金史》的金人死亡時間紀錄狀況，【表四】為整理後的結果。

姓名	《要錄》時間	《金史》時間	出處
太祖	1123 宣和五年五月乙丑	1123 天輔七年八月戊申	2：42
完顏宗望	1127 建炎元年六月己卯 21	1127 天會五年六月庚辰 22	3：57
劉彥宗	無，1129 建炎三年秋記已逝世	1128 天會六年十月癸酉	3：59
完顏婁室	無，1131 紹興元年十月乙亥記已逝	1130 天會八年十二月丁丑	3：62
耶律余睹	1132 紹興二年秋	1132 天會十年十一月癸未	3：64
楊朴	1132 紹興二年秋	無	無
太宗	1135 紹興五年正月	1135 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	3：66
完顏宗輔	1135 紹興五年夏	1135 天會十三年五月甲申	4：70
唐括氏	1135 紹興六年春	1143 皇統三年三月丁酉	4：79
高慶裔	1137 紹興七年夏	1137 天會十五年六月庚戌	4：71
劉思	1137 紹興七年夏	1137 天會十五年六月庚戌	4：71
完顏宗翰	1137 紹興七年七月辛巳	1137 天會十五年七月辛巳	4：71
出忽質子	1137 紹興七年秋	無	無
熙宗妃	1137 紹興七年秋	無	無
耶律吳十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1139 天眷二年六月辛亥	4：74
完顏宗磐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1139 天眷二年七月辛巳	4：74

完顏宗雋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1139 天眷二年七月辛巳	4 : 74
完顏宗英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無	無
完顏宗偉	1139 紹興九年七月辛巳	無	無
完顏昌	1139 紹興九年八月戊午 11	1139 天眷二年八月辛亥 4	4 : 75
完顏希尹	1140 紹興十年九月	1140 天眷三年九月癸亥	4 : 76
蕭慶	1140 紹興十年九月	1140 天眷三年九月癸亥	4 : 76
王倫	1144 紹興十四年七月戊午	1144 皇統四年正月己未	4 : 80
宇文虛中	無，1145 紹興十五年九月壬子記已被殺	1146 皇統六年六月乙巳	4 : 82
完顏宗弼	1145 紹興十五年十月	1148 皇統八年十月辛酉	4 : 84
完顏元	1145 紹興十八年九月	1149 皇統九年十月乙丑	4 : 86
張鈞	1149 紹興十九年四月	1149 皇統九年五月戊子	4 : 86
熙宗	1149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	1149 皇統九年十二月丁巳	4 : 87
完顏宗敏	1149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	1149 皇統九年十二月丁巳	4 : 87
完顏宗賢	1149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	1149 皇統九年十二月丁巳	4 : 87
完顏充	無，1150 紹興二十年正月甲申記稍後逝世。	1152 天德四年十二月庚寅	5 : 100
完顏亨	無，1150 紹興二十年三月記已被殺。	1150 天德二年十月辛未	5 : 95
完顏撒离喝	無，1150 紹興二十年三月記已被殺。	1150 天德二年十月辛未	5 : 95
完顏宗安	無，1150 紹興二十年三月記已被殺	1150 天德二年十月辛未	5 : 95
完顏宗本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1150 天德二年四月戊午	5 : 94
完顏宗懿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1150 天德二年四月戊午	5 : 94
完顏秉德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1150 天德二年四月戊午	5 : 94
唐括辯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1150 天德二年四月戊午	5 : 94
完顏宗義	1150 紹興二十年四月	1150 天德二年十月辛未	5 : 95

蕭裕	1154 紹興二十四年	1154 貞元二年正月庚申	5 : 102
馮長寧	1155 紹興二十五年	無	無
祁宰	1160 紹興三十年一月壬寅	1159 正隆四年十二月乙亥	5 : 111
徒單氏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癸丑	1161 正隆六年八月癸丑	5 : 114
韓汝嘉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丙辰	無	無
孔彥舟	無，1161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記已被殺	征宋前夕	79 : 1784
張通古	無，1161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記已被殺	1156 正隆元年	83 : 1861
蕭玉	無，1161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記已被殺	世宗年間	76 : 1736
海陵王	1161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 未夜漏未盡二鼓	1161 正隆六年十一月乙未	5 : 117

【表四】《要錄》與《金史》的金人死亡時間<sup>108</sup>

【表四】整理了《要錄》所記的金人死亡時間在《金史》中的記載情形，其中的金人姓名可有兩點說明。第一是「熙宗妃」的姓名。熙宗妃之死，《要錄》記紹興七年（1137）秋「金國大內都點檢出忽質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皆伏誅」，但《金史》中，一無熙宗后妃私通的記載，二來所記之后妃遭殺皆約熙宗晚年事。對照後，《要錄》的熙宗妃身份仍難辨識，【表四】便仍以「熙宗妃」列名。<sup>109</sup>第二是人名的調整。兩書有六人同人異名，即《金史》之完顏宗望、完顏宗翰、耶律吳十（？-1139）、完顏撒离喝（？-1150）、完顏宗安（？-

<sup>108</sup> 【表四】說明：

- 1、各列排序以《要錄》所記金人死亡時間為序，人名以《金史》為準。
- 2、兩書的日期，原文皆以干支留記。如果兩書記載年月不同，則時間差異狀況明顯，干支日期將保留原貌註記。如果兩書記載僅有日期相左，本表將於干支日期後以阿拉伯數字註記數字日期。如「建炎元年六月己卯 21」，即「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 3、由於【表一】已有《要錄》出處，本表「出處」一欄將專指《金史》出處，卷頁表示方式同表一。

<sup>109</sup>（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14，頁 2142。（元）脫脫等，《金史》，卷 63，〈后妃上〉，頁 1503-1504。

1150）、唐括辯（？-1150）、祁宰（？-1159），以上《要錄》分作「完顏宗傑」、「完顏宗維」、「胡矢」、「完顏撒離喝」、「完顏沙只」、「同古辨」、「祁宣」，表四均以《金史》為準。最後，調整了姓名用字後，為了具體比較兩書記載的出入，不同於表一以事件為單位，表四改以人物羅列，收四十八人。

【表四】可見兩書所記的金人死亡時間多有不同，下以【表五】整理其差距程度：

時間差距		人物姓名與人數
同日		完顏宗翰、完顏宗磐、完顏宗雋、熙宗、完顏宗敏、完顏宗賢、徒單氏、海陵王，八人。
同月	同月異日	完顏宗望、完顏昌，二人。
	《要錄》僅記月份	太宗、完顏希尹、蕭慶、完顏宗本、完顏宗懿、完顏秉德、唐括辯，七人。
同年	同年異月	太祖、耶律吳十、王倫、張鈞、完顏宗義、祁宰，六人。
	《要錄》僅記季節	耶律余睹、完顏宗輔、高慶裔、劉思，四人。
	《要錄》僅記年份	蕭裕，一人。
不同年		唐括氏、完顏宗弼、完顏元，三人
無法確認	僅《要錄》有記時間	楊朴、出忽質子、熙宗妃、完顏宗英、完顏宗偉、馮長寧、韓汝嘉，七人。
	僅《金史》有記時間	劉彥宗、完顏婁室、宇文虛中、完顏充、完顏亨、完顏撒離喝、完顏宗安、孔彥舟、張通古、蕭玉，十人。

【表五】《要錄》與《金史》之金人死亡時間差距

【表五】可見兩書記載相同者有完顏宗翰等八人，佔總數四十八人之 16%。其餘四十人，兩書記載相異，有者同月但不同日，如完顏宗望等兩人；另有太宗等七

人，《要錄》僅記至月份，但與《金史》同。有者同年但不同月，如金太祖等六名；另有耶律余睹（？-1132）等四人與蕭裕一人，《要錄》分別記至季節、年份，但均與《金史》同年。有者連年份亦是不同，如太宗皇后唐括氏（？-1143）等三名。差距最大者當為有無記載之別，其中《要錄》有記死亡時間而《金史》未記者有楊朴等七人，《金史》有記而《要錄》僅記已知死亡者有劉彥宗等十人。

《要錄》與《金史》的異同，可更就兩書皆留死亡時間的記載情形觀察。首先，兩書皆記的三十一名金人，表四可見《金史》皆能留下詳至日期的死亡時間，《要錄》則僅留十四人的死亡日期，即「同日」一列的八人，「同月異日」的二人，以及「同年異月」中的太祖、耶律吳十、王倫、祁宰等四人，其餘十七人《要錄》則僅提供月份以上的時間。再者，扣除掉年月日記載皆同的八人，有二十三人兩書記載有異。與《金史》相較，《要錄》的差異現象約有兩種，一是描述有異，同月異日、同年異月、不同年份等三種紀錄狀況皆屬此類，另有未死而記已死的蕭玉亦可歸於此類；二是敘述相對模糊，如僅記月份、季節、年份等三種紀錄狀況便是如此。

《要錄》所記的死亡金人，在《金史》內，其死亡時間多由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等四帝〈本紀〉所記，而此四帝〈本紀〉乃據金朝官修之《國史》與《實錄》撰成。初步檢查這些記載的紀錄情境，由於這些金人的死亡時間並無調整需要，考量其資料來源與事件性質，《金史》敘述應較宋方文獻更合現實。<sup>110</sup>在此前提下，《要錄》敘述如與《金史》落差越大，或可視為背離真實越遠，

<sup>110</sup> 四帝〈本紀〉來源，詳參邱靖嘉，《〈金史〉纂修考》，頁 159-161。不過，此處同意的是《金史·本紀》與金朝官修史書在本文所論諸人的死亡時間記載的真實性，其他敘述則可再議。金朝官方改寫史實之例，或見海陵王的「暴行」與金朝開國前史事，詳參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頁 1-14；池內宏，〈金史世紀の研究〉，《滿鮮史研究·中世》，第 1 冊（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頁 325-459。另一方面，也非所有《金史》敘述皆可視為金方紀錄，《金史》也曾摻入不少宋元說法。宋人說法部分，施宜生的晚年遭遇即是一例。施宜生，降金宋人，曾於海陵王時期使宋。返金後，《金史》記施宜生使宋時曾洩海陵王南侵意圖，「坐是烹死」，見（元）脫脫等，《金史》，卷 79，〈施宜生傳〉，頁 1787。此說亦有宋方記載，見（宋）岳珂，《桎史》（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頁 9。然而元人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指出，《世宗實錄》與蔡珪所撰之〈施宜生行狀〉皆指施宜生未被海陵王所殺，後仕至大定二年，逝於大定三年六月，見（元）蘇天爵，《滋溪文稿》（陳高華、孟繁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5，〈三史質疑〉，頁 424。蘇天爵之說今日已獲許多學者認同，見劉浦江，〈書《金史·施宜生傳》後〉，《文史》，第 35 輯（1992），頁 270；薛瑞兆編著，《金代藝文敘錄》，頁 1268-1271。施宜生遭遇，《金史》記載便非金方紀錄，是宋方紀錄的餘緒。

《金史》可暫時作為比對《要錄》記載「正確性」的對照組，也因此《要錄》的時間描述如與《金史》有異，或可稱為「錯誤」，如果缺乏更小時間元素的描述，或可視為「模糊」。當記載有異者為二十三人，其數已佔兩書皆有死亡紀錄的三十一人中的 74%時，《要錄》敘述似可指為多有「錯誤」與「模糊」的問題。

「多有問題」的說法是與《金史》比較的結果，但如與《要錄》以前的南宋撰述相較，《要錄》記載的「正確性」實是大幅提升。比較【表二】的《要錄》史料來源及李心傳對於前人說法的取舍結果，以及【表五】的敘述差異情形，其關係可有兩點說明。首先，如就已有前人記載的調整而言，就其結果的「正誤」所見，理論上這些調整將有四種變化，一是前說有誤而《要錄》承襲，抑或調整後仍有錯誤，二是前說有誤而《要錄》改正，三是前說無誤而《要錄》錯改，四是前說無誤而《要錄》承襲。四種變化中，第一、四種是持平的調整，第二種是改善，第三種則是不當調整。整體而言，死亡時間描述全與《金史》相同的八人五事，其調整皆屬第二與第四種，其中完顏宗翰之逝、熙宗、完顏宗敏、完顏宗賢等三人的被殺乃屬第二種，其餘之四人三事則屬第四種。至於死亡時間描述與《金史》不同者，則皆屬前說有誤而《要錄》承襲，抑或調整後仍有錯誤的第一種變化。換言之，《要錄》的調整並無降低「真實」程度的第三種變化。再者，如將《金史》敘述視為「真實」，除了能以第二種與第四種的變化完成符合《金史》說法的「絕對真實」的調整外，在第一種調整後仍有錯誤的變化中，《要錄》也常有更趨近於《金史》說法，即「相對真實」的調整。「絕對真實」的調整，如海陵王的被殺時間，眾說之中最後李心傳選擇了符合《金史》記載的說法。「相對真實」的調整，如完顏宗望的逝世時間，《金虜節要》、《燕雲錄》兩書各執一說，最終李心傳選擇了《金虜節要》之說，而與《金史》記載僅差一日。換言之，雖然與《金史》敘述或現今所知的金史知識相較，《要錄》仍有一些模糊、錯誤，乃至於遺漏等問題，但如與現存南宋史書相較，《要錄》應是留下了最為大量的精確記事，此處顯示了李心傳的用心及史學功力。



## 陸、前人資料對於《要錄》敘事的影響

相較於其他南宋史書，《要錄》留下了最大量且精準的金人死亡時間，敘事品質相對傑出。不過如果相較於《金史》記載，《要錄》仍多問題。目前看來，這些問題應是來自《要錄》參引的前人資料。

首先，推估《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前人資料取用步驟，大致可為：一，根據資料來源確認其資料性質；二，藉其性質確認資料可否信任；三，可信的資料，一說即取，多說則辨而後用。唯此步驟之中，資料能否可信將是關鍵，如果誤判資料性質，取用難免失當，不用《金太祖實錄》與誤用《征蒙記》便是一例。不用《金太祖實錄》的原因，學界已有解釋，一是李心傳可能無法辨識該書性質，二是李心傳可能是從他書取得其說，或取用了節抄本，由於所見片段而不敢輕信。<sup>111</sup> 無論如何，最終李心傳並未信任《金太祖實錄》，改採了在消息的傳遞過程中，其實是具有更多轉傳程序的歸正人撰述。<sup>112</sup> 也要補充，太祖逝世日期，《金史》記「戊申」（28）日，《要錄》與《會編》所示之《金太祖實錄》卻作「乙未」（15）日，宋人所見的《金太祖實錄》或有誤抄。因此也不排除此一傳抄的錯漏嚴重，或只是他書中的片段引用，遂是難以輕信，如此則《金太祖實錄》的記載便非誤棄，而是斟酌後的捨棄。至於《征蒙記》，雖然其書多留當代實況，但今已知應為宋人拼湊之作，記事良窳便更加參差，取捨也需謹慎。唯當難見他說，又遭誤判為「北人之作」時，稗莠不免附雜，而遠離真實的完顏宗弼死亡時間也被《要錄》所收，其紹興十五年十月的死亡時間，距離《金史》所載的皇統八年十月辛酉，差距已達三年。

再者，即便是性質相對可靠的前人資料，記載內容也會虛實各有，《要錄》大量參引的長期滯金宋人或歸正人的著述又需特別留意。宋人對於金朝的消息，可藉南傳的金國文獻、使臣與諜探的報告、南來北人的撰述等三大管道得知，<sup>113</sup>

<sup>111</sup> 劉浦江，〈關於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頁5，註1；邱靖嘉，《《金史》纂修考》，頁32；陳昭揚，〈宋人紀錄中的金太祖諸子——以「集體描述」為中心的觀察〉，頁22、36。

<sup>112</sup> 已見《金太祖實錄》有載且符合今知之金朝史實，卻被李心傳棄用而轉採有誤說法之事，又有完顏宗望的身份。李心傳據《神麓記》稱宗望乃完顏昌之子，指《金太祖實錄》記二太子名宗望有誤。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頁11。

<sup>113</sup> 宋朝取得金朝消息的管道，詳參劉浦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劉

在金人死亡時間的部分，金朝官文書與兩國使臣的正式報告也許是相對原始的消息來源，但在《要錄》確認金人死亡時間的過程中，主要依據還是能有長期在金生活經驗之人的私家撰述。只是回對《金史》，其實這些私家撰述大多無法留下精準的金人死亡時間，僅有《松漠紀聞》與《神麓記》能夠各留完顏宗磐等人被殺與海陵王遭弑的正確時間，而《松漠紀聞》的說法又是來自〈誅宋克諸王詔〉。相對而言，《要錄》中死亡時間描述完全「正確」的八人五事中，除了海陵王太后徒單氏外，其餘七人的死亡事件皆有公開傳播的現象，也有金朝官方訊息的發佈，宋人可以多方查探，毋須仰賴單一資料來源。由於能有長期在金生活經驗之人的私家撰述乃是《要錄》敘述的主體依據，但當這些私家撰述只能對多數的金人死亡消息提供較為模糊或有疑慮的記載時，在無多方資料可供對勘的情形下，因為資料不足的侷限與李心傳積極留記的態度，《要錄》的紀錄品質也將受到資料品質的密切牽動。

這些前人資料難能提供正確的金人死亡時間，或與兩種撰述背景有關，一是撰述創作與事件發生的時間距離，二是撰述者與紀錄對象活動場合的空間距離。以《要錄》頻繁參引的《神麓記》為例，該書始末仍多不明，但已知作者苗耀或為金地成長而後歸宋之漢人，成書時間約在宋孝宗時期以後，記事範圍自女真起源至海陵王被殺，內容頗多金廷內情，尤其是高層權貴的人事互動。這種成書背景與記事內容的關係，第一，如是海陵王即位以後之事，《神麓記》便近時人報導，如是熙宗朝以前之事，事發與成書的時間就差距不小。當苗耀並非早有撰述準備，又難攜帶大量資料前來宋朝，<sup>114</sup> 在宋之時就不容易精準留下這些早遠舊事的具體細節，死亡時間也難確實提供。第二，由於可記死訊的金人均屬高官重臣，然而現今已知金初政壇的族群壁壘仍是嚴峻，高層核心仍以女真權貴為主，雖有少數漢臣得以參與，但須謹言慎行，如韓企先（1082-1146）便以「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而長保其位，田穀則以張揚而被殺。<sup>115</sup> 在此內外隔閡嚴峻，政爭細節、貴戚私密的消息等未必能為局外漢人輕易得知的時代，目前又看不出

浦江，《宋遼金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199-222；薛瑞兆編著，《金代藝文敘錄》，頁 125-139；黃純豔，〈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2 期（2011），頁 141-149。

<sup>114</sup> 金朝禁限北人攜帶文獻赴宋，詳參劉浦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頁 210。

<sup>115</sup> （元）脫脫等，《金史》，卷 78，〈韓企先〉，頁 1778；卷 89，〈孟浩〉，頁 1979。

苗耀曾經身處金朝政壇核心的情形下，這些「北人之作」的女真高層消息，輾轉聽聞而得的可能性就甚高。<sup>116</sup> 如此，《神麓記》的金朝高層事蹟，部分將是後人記前事，整體又是外人說內情，其中的金人死亡事件，能夠正確記下死亡時間者就僅有海陵王被殺，餘者如太宗逝世便僅記月份，完顏希尹、完顏昌、熙宗被殺等三事則是僅述情節未言時間。<sup>117</sup>

同時，金初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可能也有影響。可以留意到在《要錄》相對可記的金朝重要人物中，未能留下死訊的完顏宗幹與劉豫，與未能留下正確死亡時間的太祖、太宗、完顏宗弼等人，他們皆在金朝內地及其周遭地區辭世，主要又在當時金朝的國都，約於今日中國黑龍江省阿城市，該地原稱「御寨」，天眷元年（1138）後建號「上京」。<sup>118</sup> 這些地方深處北境，除非能夠確認紀錄者在消息發生之際曾在當地，否則以目前可知投宋漢人原居之處總在燕雲以南的情形下，所得消息便需長途轉傳，精準得知就有更多變數。

最終，經由金朝高層死亡時間的敘述，不免令人聯想可以如何看待這些「北人之作」之中的金朝高層事蹟。或許在《燕雲錄》、《金虜節要》、《松漠紀聞》等書記太宗、熙宗時期事，《神麓記》等書記海陵王時期事能有時人報導的性質，但如是《神麓記》記海陵以前事則已屬後人追記；除了洪皓與趙子砥曾經長居金朝內地，洪皓又能與完顏希尹密切互動而可親自見聞一些高層秘辛外，<sup>119</sup> 餘人如張匯、張棣、苗耀等就難知能有類似經歷，所傳消息恐有外人說內情的隔

<sup>116</sup> 另一方面，目前所見，金初也無類似兩宋，能有較為正規、常態性的朝廷動態傳播管道，這應該也會影響到民間對於金朝內情的接收。宋朝政治消息的流佈機制，詳參朱傳譽，《宋代新聞史》（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游彪，〈宋代朝廷地方之間的「文字」傳遞〉、〈宋朝的邸報與時政〉，文收游彪，《廟堂之上與江湖之間：宋代研究若干論題的考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30、44-55；久保田和男，〈宋朝における中央情報の地方伝達について——邸報と小報を中心として〉，《『宋代中国』の相对化》（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27-31、36。

<sup>117</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65，頁 9b-10b；卷 197，頁 8a；卷 197，頁 3a；卷 216，頁 10b。

<sup>118</sup> 金朝國都，詳參劉浦江，〈金朝初葉的國都問題——從部族體制向帝制王朝轉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態〉，劉浦江，《宋遼金史論集》，頁 33-58。另外，劉豫的死亡地點不明，目前僅知晚年住在舊遼上京之地，以夫子廟為居所。此事《要錄》繫於紹興七年十二月甲戌，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17，頁 2184。《要錄》未言此事史源，但對比前人資料，有《小曆》與《金虜節要》亦記劉豫被遷始末，見（宋）熊克，《中興小紀》，卷 23，頁 7a-b；（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82，頁 19a-b。由於《要錄》與《小曆》皆不離《金虜節要》所記，《金虜節要》應是此則記事的最初來源。劉豫逝世所在的舊遼上京之地，雖非金朝國都，但亦遠北之地，而僅見《金虜節要》有說之狀，便略見北事南傳的困難。

<sup>119</sup> 洪皓與完顏希尹的關係，見外山軍治，〈松漠記聞の著者洪皓について〉，頁 639-640。

閱。如是追記或外人說內情，誤傳錯記的機會便更多。但也必須補充，「北人之作」自然有其信實之處，不宜全面抹煞其價值。《神麓記》曾記完顏希尹被殺前與完顏宗弼的衝突言行，由於衝突場景私密，苗耀敘述又是活靈活現，令人懷疑乃是小說家言。<sup>120</sup> 可是其中的情節主體，包括完顏希尹與完顏宗弼私下的酒後爭執、完顏宗弼向完顏宗幹與熙宗告密、完顏宗幹為完顏希尹開脫、熙宗支持完顏宗弼意見等四點，實於大定二十二年（1182）前後立碑的〈完顏希尹神道碑〉中可見。<sup>121</sup> 這些相似性，使得苗耀的敘述依稀有其根據，碑文故事可能已為苗耀所知。因此本文僅是提醒，從金人死亡時間的線索所見，欲由這些北人私家著作論說金代史實，尤其是金朝高層的言行之前，所說如是「一家之言」，包括見僅一處記載或雖見多處但卻系出同源，在尚未確認說法根據前，宜可謹慎看待。

## 柒、結論


討論之前，我們應該都能同意《要錄》中的金國記事，其樣貌應是多元，內容總是虛實交參，得知經過也是輾轉曲折。本文則是指出在金人死亡時間的紀錄中，其多元樣貌與虛實內容的具體分佈狀態，以及記事成果與相關文獻及現今所知的差異程度，並整理了《要錄》可以參引的前人資料，分析這些資料對於《要錄》敘事的影響。

整體而言，《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敘述，在記事內容與資料來源等兩方面中約有幾點特性。第一，《要錄》的記載對象多為政壇要員，這應是李心傳有意留存金朝重要政治消息的結果。第二，《要錄》對於金人死亡時間的描述形態相當多元，顯露《要錄》對於個別金人死亡事件不同的掌握程度。第三，《要錄》應是現存南宋史書中能有最多精確記載金人死亡時間之作，再因吸收了《小曆》、《會編》等前人著作的成果，其成果又被《宋史全文》繼承，《要錄》在

<sup>120</sup>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97，頁 2-3；（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37，頁 2591。

<sup>121</sup> （金）王彥潛，〈大金故尚書左丞相金源郡貞憲王完顏公神道碑〉，文收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冊 13，頁 783-785 影羅振玉校錄，《滿州金石志》（民國二十六年石印本），卷 3。立碑時間，見張博泉，〈金完顏希尹碑史事考辨〉，《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1985），頁 44-48。

南宋史書的金事流傳歷程中遂有一種傳承樞紐的地位。第四，與《金史》敘述或現今所知的金史知識相較，《要錄》雖然多有正確記事，但亦不乏模糊、錯誤、遺漏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應與李心傳所能參引的資料有限，以及參引資料不易提供李心傳書寫所需的精確記載有關。第五，《要錄》的主要參引對象是能有在金生活經驗的北人的著作，然而這些作者即便曾經長居北方，但在撰述時間、生活空間、活動場合的隔閡下，恐怕不易直接獲得這些多屬金朝政壇高層內情的金人死亡消息，而當消息乃是輾轉得知時，細節便難精準提供。《要錄》紀錄金人死亡時間的挑戰，除了來自於宋人得知金事的曲折外，也來自於這些北人得知金朝內情的隔閡。

此次討論後，亦有一點延伸思考。可以留意到宋方紀錄，至少是在《要錄》的金人死亡時間敘述中，北人的私家著作常獲重用，金朝的官文書並非主要來源，宋朝官方的消息徵收管道，包括使節與諜探，發揮的效果也有限。如果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金人死亡時間，也在其他金代事實的紀錄中，此一現象對於南宋所知金事的影響，宜可繼續觀察。

## 徵引書目

### 一、史籍文獻

- (宋)佚名，《宋史全文》，汪聖鐸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
- (宋)佚名，孔學輯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規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辛更儒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胡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清抄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出版時間不明，索書號 20225101860。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宋)岳珂，《程史》，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陀粹編·續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洪皓，《松漠紀聞》，張劍光、劉麗整理，全宋筆記第 3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宋)員宗興，《九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晁公邁，《歷代紀年》，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史部，第 2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三年盱江郡齋刻本影印。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52-2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日本鈔宋本縮印。
- (宋)熊克，《中興小紀》，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 (宋)趙甦之撰，許起山輯校，《中興遺史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
- (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四明樓氏家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 (元)脫脫等，《宋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元)脫脫等，《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陳高華、孟繁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  
(清)施國祁，《史論五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7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據湖州叢書本影印。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 二、專書

- 王瑞來，《文獻可征——宋代史籍叢考》，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  
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64。  
朱傳譽，《宋代新聞史》，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  
池內宏，《滿鮮史研究·中世》，第 1 冊，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李輝，《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邱靖嘉，《《金史》纂修考》，北京：中華書局，2017。  
張博泉等著，《金史論稿》，第 2 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梁太濟，《唐宋歷史文獻研究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游彪，《廟堂之上與江湖之間：宋代研究若干論題的考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劉浦江，《宋遼金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  
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薛瑞兆編著，《金代藝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  
王德毅，《宋史研究集》，第 2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

## 三、專書論文

### (一) 中文

- 王德毅，〈洪容齋先生年譜〉，王德毅，《宋史研究集》，第 2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頁 405-474。

### (二) 日文

- 久保田和男，〈宋朝における中央情報の地方伝達について——邸報と小報を中心として〉，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中国』の相对化》，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15-44。

#### 四、期刊論文

- 李秀蓮，〈阿骨打稱都勃極烈與金朝開國史之真偽研究〉，《史學月刊》，2008 年第 6 期（2008），頁 43-49。
- 李海燕，〈試論熊克《中興小紀》的史料來源與流布過程〉，《新鄉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3 期（2012），頁 67-70。
- 李寒簫，〈再論《行程錄》的真偽問題〉，《歷史教學》，2019 年第 6 期（2019），頁 61-72。
- 周立志，〈《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與《中興小曆》之關係〉，《文獻》，2010 年第 3 期（2010），頁 104-112。
- 胡坤，〈臺灣藏清鈔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版本蠡測〉，《文史》，2018 年第 2 期（2018），頁 87-106。
- 范立舟，〈《松漠紀聞》史料價值舉例〉，《史學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2002），頁 60-64。
- 孫建權，〈關於張棣《金虜圖經》的幾個問題〉，《文獻》，2013 年第 2 期（2013），頁 133-139。
- 張博泉，〈金完顏希尹碑史事考辨〉，《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1985），頁 44-48。
- 陳昭揚，〈宋人紀錄中的金太祖諸子——以「集體描述」為中心的觀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2019），頁 1-48。
- 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第 2、3 分（1936），頁 193-341。
-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衝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3 本第 1 分（1971），頁 135-161。
- 程尼娜，〈《金史》「篡改開國史」辨〉，《史學集刊》，2022 年第 1 期（2022），頁 4-19。
- 黃純豔，〈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2 期（2011），頁 141-149。
- 葉帥，〈關於金朝開國史相關材料的再思考與新認識〉，《學習與探索》，2018 年第 5 期（2018），頁 168-173。
- 董四禮，〈也談金初建國及國號年號〉，《史學集刊》，2008 年第 6 期（2008），頁 94-98、117。
- 蒙文通，〈從采石瓜洲斃亮記認識到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四川大學學報》，1955 年第 2 期（1955），頁 159-165。
- 趙永春，〈洪皓使金及其對文化交流的貢獻〉，《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



1997 年第 1 期（1997），頁 9-14。

趙宇，〈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補正〉，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2 輯（2017），頁 160-169。

劉浦江，〈書《金史·施宜生傳》後〉，《文史》，第 35 輯（1992），頁 270。

## 五、學位論文

聶樂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 六、其他

趙維國，〈《采石瓜洲斃亮記》點校說明〉，上海師範古籍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6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 265-282。

趙維國，〈《采石斃亮記》點校說明〉，上海師範古籍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6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 283-292。

（責任編輯：許恕）